

求索集

■ 主编 / 周斌 李安东

QIUSUO
JI

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
是曲折的，
也是开拓性的。
从内容，
形式与中国古代文学
保持着继承、
借鉴与革新关系；
在艺术上，
它又不断从域外文艺思潮
和文学作品中
汲取营养，
丰富壮大
自己。

■ 著 / 周斌

吉林文史出版社

● 文学放谈丛书

求索集

■ 著／周斌

■ 主编／周斌 李安东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索集/周斌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12

(文学放谈丛书)

ISBN 7-80702-153-5

I. 求... II. 周...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5883号

责任编辑: 林革华 耿 宏

封面设计: 女娲文化工作室·琦珩

书 名	求索集 Qiusuo Ji
主 编	周 斌 李安东
作 者	周 斌 著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7-80702-153-5/I·36
定 价	16.00 元

第一辑

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要特质 / 2

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反封建主义思潮 / 13

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体制的转轨 / 26

贴近民众 表现民众 引导民众

——论面向新世纪的文艺与民众之关系 / 36

第二辑

在时代需要和自身发展中趋于成熟

——论20世纪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中篇小说创作 / 48

走向大众

——论20世纪新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篇小说创作 / 65

张恨水与市民文化 / 82

探索者坚实的脚步

——王蒙作品漫评 / 95

值得警觉的创作倾向

——对张笑天创作中某些失误的思索 / 104

改革者的颂歌 创业者的雕像

——评报告文学集《神奇的土地》 / 114

愿为人民歌与呼

——李国文同志访问记 / 120

目 录

①求②索③集

关于传记写作的通信 / 126

第三辑

论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 / 130

家园的向往与失落

——论“五四”女剧作家的创作倾向 / 138

论老舍的戏剧观 / 151

论老舍剧作的幽默特色 / 163

从《上海屋檐下》看夏衍的戏剧观 / 175

开端的艺术

——论夏衍剧作的第一幕 / 193

论夏衍剧作的情趣美 / 205

契诃夫剧作风格和夏衍剧作风格之比较 / 221

论中国古典戏曲和古典文学对夏衍话剧创作的影响 / 236

第四辑

应对WTO: 中国电影困境、机遇和对策 / 253

电影美学: 面向现实、面向创作、面向观众 / 269

编剧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 / 278

后记 / 282

第一辑

论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要特质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反思新文学近百年演变的经验教训时，就会发现它具有以下的主要特质：

(一)新文学的主流是人民大众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表现为极大地加强了文学与人民大众的联系，以及文学与进步社会思潮和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不仅使人民大众成为新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接受对象，而且充分体现了新文学的社会价值，发挥了其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并为其审美价值增添了新的因素；反之，也推动了新文学在不断适应社会变动和民众需要的基础上，促使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和主要传统，并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得到继承和延续。

众所周知，“五四”文学革命是由倡导白话文开始的，这就体现了文学必须能为最广大的民众所接受的历史要求。因为文言乃文人雅士所熟悉和惯于操练的语言，与人民大众相隔膜；而白话乃普通民众熟知和运用的语言，是新鲜的、活的语言。故而，只有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才能使新文学作品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更何况语言的变化还反映了时代的本质变化，在社会历史转型期中，文言已失去其原有的价值和地位；而白话则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同时，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还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以表现普通民众的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重铸民族灵魂作为文学的根本任务。在这样的倡导下，创作中则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批新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民众，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取代了旧文学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新文学的主人公；同时，也揭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的

文学主题,显示了新文学彻底反封建主义的倾向。

“五四”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与历史的这一发展趋势相适应,从20年代后期起,在文学上则提出了以工农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和表现对象的创作要求。30年代初,“左联”成立以后,更明确规定了以大众化作为左翼文学运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其意也在于进一步加强文学与民众的联系,并充分发挥文学在实际斗争中的作用。同时,在创作中也进行了从正面表现革命群众斗争和塑造觉醒中的工人、农民形象的艺术尝试。尽管在理论倡导上有一些偏激之处,此类作品也有不少仍较稚嫩,并出现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但毕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另外,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也有了新的开掘,较着重从知识分子与人民、与革命的关系这一角度,探讨与展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途,指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道路,乃知识分子的正确之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则作了大众化、通俗化的探索与实验,显示了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新进展。

抗战时期,民族危难和救亡图存使广大作家与人民大众有了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追求,推动着一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走出个人小天地,深入民众,并与之同甘共苦。“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当时不同政治艺术倾向的作家们的共同要求和实践。尽管对文学救亡功能的特殊强调,使大多数作品在宣传教育的层面上发挥着作用,审美的因素在较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但文学与民众的关系则更加紧密了。抗战中期展开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使文学与民众的关系、作家与民众的关系成为理论家和作家关注、思考的中心,力求使新文学作品更加民族化和大众化,更加坚实与丰富,并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在创作中,爱国主义成为文学的重大主题,许多作品热情地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新人的诞生和新的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抗战中、后期又转向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入思考与开掘,

着力于暴露破坏抗战、阻碍民族进步的现实黑暗势力,进一步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性格的优劣得失,充分显示了大多数作家对于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及与祖国、与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同时,在文学形式上也有新的变化:抗战初期小型、通俗作品的大量出现,中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长篇小说、多幕话剧、长篇叙事诗和电影的繁荣,都适应了时代与民众的需要,促进了文艺与民众、与时代更密切的结合。

至于在建立了人民政权的革命根据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要以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作家也获得了真正深入工农兵生活、熟悉了解其生活和情感的自由;而工农兵自身在文化上的初步入门和逐步提高也具备了接受和创造新文学的客观可能性。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以工农兵为主要描写对象和歌颂对象的新颖作品;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也受到作家们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并形成了一些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学流派。

新中国成立以后,仍坚持和强调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虽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偏差,出现了一些较明显的“左”的倾向,从而局限了文艺创作的题材领域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导致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产生;但文艺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并未中断,许多作品仍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强调到了极端,但实质上文艺作品已不能表现广大民众的心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文艺园地,一片荒芜。仅有的“样板戏”则集中体现了当时定于一尊的政治意识形态,而“阴谋文艺”作品则完全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但是,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创作活动仍然在表达着知识分子和人民的愿望。特别是天安门广场诗歌运动,乃是广大民众用文学的形式来反抗“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达蕴藏已久的革命情绪的一次集中体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阴谋文艺”和“三突出”等谬论受到批判，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复和发扬，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许多作家“敢为人民鼓与呼”，不断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受到广大民众欢迎，并引起他们共鸣的好作品。80年代以后，文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重又得以强调，文学在开拓创新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由复苏走向繁荣。90年代以后，尽管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影响下，文学的多元化趋向日益明显，作家的创作个性更加鲜明，但关注民众需求、表现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情感、体现文学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创作仍是主流。

（二）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

由于新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接受对象是人民大众，故而就决定了它对创作方法的选择。在“五四”新文学的开创时期，域外各种文艺思潮、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均被输入中国，曾在中国文坛上纷纷登台亮相，许多作家也曾在广泛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探索 and 大胆实验。于是，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三足鼎立，左右着“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潮流。但是，随着陈独秀、胡适等对西方现实主义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积极推荐，随着文学研究会对“为人生的文学”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实践，现实主义文学日益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新文学的启蒙性质也决定了文学创作必须面向时代，面向现实，真实、深刻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以激发广大民众变革现实的热情，故现实主义的影响渐盛。

30年代，随着左翼文学的勃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广泛传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更多的作家所接受，现实主义文学也随之有了很大拓展，成为新文学的主潮。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无论是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理论阐述的译介，还是鲁迅、冯雪峰等在文艺论争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

发,抑或是周扬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关理论等,均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普及和发展。而理论的发展自然也对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0年代,在民族民主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社会的大动荡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不仅对文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给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使其有了进一步深化,由此也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佳作。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尽管部分文章带有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或洋八股的缺点,许多问题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毕竟反映了较多的文艺家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入了;而胡风力图把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努力,则是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新贡献。

自50年代起,从苏联移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注重强调深刻揭示社会本质和“指出理想的前景”,以社会主义精神贯注于创作之中并以此教育民众。5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此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修正。但由于过分强调了“理想因素”,把生活现象和生活本质分离开来,违背了现实主义对真实性的严格要求,导致了一大批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伪现实主义作品的产生。而赵树理、王蒙等一些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持,秦兆阳、邵荃麟等一些评论家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继续倡导,仍使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延续。

“十年浩劫”中,极左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愈演愈烈,所谓“三结合”创作方法和“三突出”创作理论,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使伪现实主义作品盛行。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原则只能体现在地下文学创作活动中。

进入新时期以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恢复和发扬,“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原则重新得到肯定。尽管由于大规模介绍域外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对新时期文学创

作的影响十分明显,并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但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因此衰退,而是有了新的拓展。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出现了一大批反思历史、触及现实、颇具社会影响的好作品;而现实主义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逐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例如,80年代中期“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就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现代主义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体现出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90年代中期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现象的论争,则是文学界在新的时代环境里对现实主义的又一次探讨,它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20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形态并不完全一样,但其基本原则和方法始终被大多数作家所采纳和运用;虽然对于不同的文学样式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并非总是现实主义文学成就最显著,但就新文学的总体发展而言,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是主潮。

(三) 新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整体

从总体上看,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从纵向上,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保持着继承、借鉴与革新的关系;从横向上,它又不断从域外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丰富壮大自己。正是纵、横两方面的联系,使新文学成为开放性的体系,具有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

众所周知,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新文学,就在于它对原来的文学传统进行了明显的变革与创新,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而适应了新的历史要求并进行了新的发展。尽管新文学在

观念、内容、形式等方面较之以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五四”时期又对传统文化和旧文学进行了彻底批判,但新文学与民族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不仅新文学创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它要适应的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且许多作家所受到的教育和具有的文学修养也都源于民族文化传统。新文学与古代文学有着一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人道主义的精神及与此相关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文学创作中是一脉相承的,是继承发展的。^[1]从屈原的《离骚》开始,爱国主义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以屈原、史马迁、杜甫、白居易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总是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热情而焦虑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通过文学作品来抒发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这一长期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特别重要和有益。因为新文学本身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民族危机的产物,而力图通过文学作品来改变广大民众的精神面貌,唤起民族的觉醒,促进民族的新生,重铸民族的灵魂,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最初的出发点和创作动机。与此相吻合,关注民族命运和国家兴亡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则是大多数新文学作家的基本品格。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着深厚的基础,较突出地表现在对被压迫人民、特别是下层社会的妇女、儿童之同情怜悯等方面。这种传统与现代、当代的民主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新文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即以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都市市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成为新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接受对象,这就不仅要求文学在内容上要真实地反映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及时表达其情绪、愿望和要求;而且还要创造出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其次,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还表现在文学形式、技巧等方面的继承和借鉴上。文学自身的发展有一种延续

性,各类文体样式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而总是需要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倘若我们从新文学各种文体样式的发展演变来考察,就会发现其与古代文学之间有着更加具体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此不逐一赘述。

如前所述,新文学是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有所不同,但域外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学蜕旧变新、走向现代,与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相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五四”时期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这种作用和影响尤为显著。也正是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汇和互渗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依据其接受主体的不同特点和所处的特定环境与氛围,在文化接受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在为我所用的“拿来”之基础上,在融会贯通中形成了各自的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不仅丰富了新文学的内容和色彩,而且为其不断拓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和优秀的作家作品。因此,新文学是由多民族文学有机组成的,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创作成果,也应该予以重视和关注。同时,新文学虽然以大陆内地的文学发展为主,但还应该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新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观之,开放性和整体性应该是新文学的显著特质。

(四) 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毋庸讳言,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从“五四”到新时期,在百年历程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从未间断过,只

不过有时尖锐,有时平缓;有时复杂,有时单一;有时与政治斗争关系密切,有时则关系较疏远。因此,文艺思潮领域里的各种斗争,乃至各种文艺运动的不断开展,便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和攻击,“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与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派,及与“学衡派”、“甲寅派”的斗争就拉开了新与旧之间矛盾冲突的帷幕。在此后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新文学的每一次创新变革、每一次突破拓展都会受到来自守旧势力不同程度的阻挠和反对,新与旧的矛盾始终贯穿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

新文学的发展既要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又要不断汲取域外的营养,在把握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常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由此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无论是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都曾受到质疑和驳斥。而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也说明新文学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学形式、方法、技巧的同时,如何保持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使之具有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重要。实践证明,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是符合国情且有益于新文学之建设的。

由于20世纪的通俗文学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观念和形式技巧,故被视为旧文学的余脉而受到排斥。但它仍然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吸取新的养料,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自80年代中期起,通俗文学潮流汹涌,其崛起既是市场经济的导向,也是政治文化氛围宽松之佐证。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长期以来的隔阂与矛盾,既说明了新文学在大众化方面的努力尚有一定的局限,未能充分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也说明了通俗文学的美学品位还须进一步提高。新文学发展过程中,雅俗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互动发展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雅俗互动能否促使雅俗合流,尚有待于实践证明。

从总体上来说,除了上述新与旧、中与西、雅与俗的矛盾冲突以外,尚有各种文学主张和文学派别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特别是20年代末以后,

由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文学主张的政治意识和文学派别的政治集团背景进一步突出，致使矛盾冲突也更加激烈尖锐。这些矛盾斗争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与右翼文人或国民党御用文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如先后与“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戡乱文艺”等倡导者的斗争。

其二，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与在复杂的环境中企图保持“中立”或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作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如20年代至30年代先后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的斗争，40年代后期与鼓吹“自由主义”的作家之间的斗争。

其三，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内部因文学见解和宗派利益而发生的矛盾冲突。如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诸作家与鲁迅、茅盾等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1936年左联内部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40年代中后期，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内部围绕现实主义、“论主观”等问题对胡风、舒芜等人的批评，均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具体体现。

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权力的直接介入，文学界的矛盾冲突又常常演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50年代先后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及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等；60年代起，又有对“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等的批判，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的批判，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导致十年浩劫。

80年代以后，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潮的清算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调整，文学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虽然不再以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方式进行文艺领域里的思想斗争，但仍有一些曲折和反复。

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其坎坷、曲折和复杂的过程,是同中华民族求解放、求新生、求发展的艰苦历程,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分不开的。

2003年6月

注释:

[1]参阅王瑶《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载《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